

中國學術大綱

上海復旦大學
武昌中華大學
等大學文哲學教授蔡尙思編著

序例

(一) 學力問題

(1) 學問的精博

(2) 心得的多寡

(二) 材料問題

(1) 材料的創因

(2) 經過的久暫

(三) 方法問題

(1) 體裁的簡明

(2) 方法的新舊

(四) 態度問題

(1) 已性的好惡

(2) 古書的得失

(五) 程度問題

(1) 程度的高低

(2) 期限的長短

(二) 學力問題 (1) 學問的精博 我們也不用談到全世界的學術，單就中國來論就很夠了；中國學術浩如淵海，近來新出的也可以不論，就是那部四庫全書，我想如要比較的完全研究一下，已經非數十年的工夫不能辦到了；再退一步，也不用談到所有的中國學術，單就其中的哲學一部分，甚至可不必說中國的一切哲學或先秦的諸子哲學，試就中國哲學中的先秦諸子，先秦諸子中的儒家來說一說吧：在漢朝那位司馬談已經說道：「夫儒者以六藝爲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漢書藝文志也說：「古之學者，……二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三十而五經立也。」在去孔子僅幾

百年間的漢朝人，還說出那種爲難的話；如在數千年後的我們，就更要叫苦連天了！這是由廣說到狹的。請再反而由少說到多，而同樣的舉出幾個例子來：如同是文學家，而杜甫雖稱詩聖而不工散，文方苞古文曾號爲一代正宗而不能詩；如同是哲學家，而道家言詳於天道，荀子說：「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而略於人道，荀子說：「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之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儒家言詳於人生而略於生物。荀子說：「能說鳥獸之類者，非聖人之所欲說也。聖人所欲說在於說仁義而理之。」這是一門也不能全長的一個例子。再進一步說：如馬班以史學稱，至於其他就像沒有，至多也不過兼長於文學罷了。這是至多祇會兼長二門的一個例子。更進一步說：就是那位以博學稱於中國的孔子，他至多也不過以哲學爲主，而兼文學、史學（？）二門罷了。文學是他的餘事，史學也有孟子的說他是「據魯史作春秋」。（春秋非真史）我們總不能說不論那一方面都是他所精到的。由廣說到狹，既如彼，由少說到多，也不過如此。

由此看來，博之一字，真是難言了。那麼我們就含博而去求精好吧？但你於此也要知道：如單單精於一點點的，以外一無所長，那也算不了什麼精，精之外還要有相

當的博，才可當做精。反而言之：就是博也要有相當的精才成，均此類推，茲不詳講。請就上頭所舉出的那個研究哲學

的例子再來引伸一下。比方你要研究孔子哲學，那就不得不再把孔子前後的先秦諸子都約略研究一下；但研究孔子同時他家的先秦諸子還不夠，就是自漢而後，中經唐宋明清，以至今人關於研究孔子的書，也要去讀一讀，就是做到這田地，還仍舊不算得夠，他如西洋的哲學史，也要約略的看一看，而其哲學名詞，尤非大加注意不可；因為中國是有哲學而少哲學名詞的此外如要完備一點，就是印度的佛學也要加以研究一下，以便大之在世界的文化上，將中國哲學同西洋印度兩方面的哲學作一比較觀；而小之也可將前後於孔子不遠的道家墨家作一比較詳細的比較論。要辦到這個地步，才配得上精的一個字。

上頭論「博」既不容易，剛才講「精」也極為難，那麼我們又要怎麼辦呢？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因為單博單精，還辦不到；至於還要精到無所不精的精，並且博到無所不博的博，精博兼長，恐怕古今中外，就是到所謂天地末日的人類止，也找不到這

種的超人來吧！至於這位年輕學淺的區區小子，那敢談到這個精博的問題呢？既然沒有精博的本領，而今爲什麼又敢編起一部無所不包的中國學術大綱來？真是令人莫明其妙！不但他人會這樣的疑問，就是我本身也具有同樣的感想。在這解答不出來的最後，只好勉強而又照實的向大家說：因爲大夏大學叫我來教授「國學大綱」，到了動筆的時候，已經半年，既沒有什麼現成的課本，那容再沒有自己的講義講義非編不可，已經迫到如此了；而這個「國學」兩字，我又把他解釋爲「中國學術」，絕對不服那般老先生「國學就是國文」的見解，就是一般認「國學」是指中國思想方面的，以及「六經皆史」的以史學包括國學的，吾也都大不敢附從。就是到現在還不改的那經史子集四部極無謂的亂分，我也要把牠改爲字法學。文學與美術 史地學 哲學與科學 文法學。文學與美術 史地學 哲學與科學 文藝學。文學與美術 史地學 哲學與科學 的新四部。又自歐化東漸，日進無已，國中始設有專門研究國學的機關，其先由北京幾個有名的大學附設國學研究院；到了現在，研究國學的聲浪，已經慢慢地走到中部來了，如上海至南京的幾個較完備的大學中，差不多

都有「國學」一系之設。但如進觀其內容，則其所謂「國學系」者，也多不過是變名不換實之「中國文學系」；其去「國學是國文」的那一個見解，僅僅五十步與百步之差而已。於是學校當局以「中國文學系」爲「國學系」，誤認於上，多數教員以「國文爲國學」，誤講於中，一般學生當然也就說「國學二字是廣到中國文學狹至國文的代名詞」，誤從於下，我一看到這一點，於是更認作一部真正的「國學大綱」或「要略」，爲刻不容緩的要圖了。尙有一要因，在略知中國學術的整個面目，與比較研究。但是如我既認國學爲「中國學術」，範圍就擴大到極點了！豈是年輕學淺的區區小子，而又在這個短時間內所能成此大舉麼？這真如一般士夫就職通電中的「才幹任重」那四個字好了！也就只好請求海內一般通儒碩學多多指教吧！

(2) 心得的多寡 我想人的精力，雖有或多或少的不同，但不論你怎樣的多，究竟還是有限的；精力既然有限，那如上頭所說的精而又兼博，便不可能了。現在還是照前的例子，也不用去說什麼世界文化，只把中國學術來說一說，已經很夠了。以

今人而論：如梁任公先生是研究及信奉中國孔學的，所以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對於儒學一部分，是比較有可觀的；胡適之先生是研究及傾向西洋文化的，所以他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對於墨學一部分，是比較爲特色的；章太炎先生是研究及贊美印度佛學的，所以在他所著書中，對於老莊是比較的有特別見解的。這是止能專精一點的一部分人。此外尙有很多學者，比方他平素是研究文學的，而今却要做起哲學書來了；或平素是研究詩的，而今却要論文起來了。或平素是研究佛學的，而今却要講起孔學來了；……但這實尙說得過去。甚至有如一般專攻八股文的山邊老秀才，也要去盲批評什麼西洋文化了；一般專學理化的洋博士，也要來大講演中國學術了；……這怎樣可以呢？中國學術既然浩如淵海，吾今對之雖然不算一無所長，但也不是並無一短，有獨長的地方，也有獨短的地方，自是同人一樣，而不能獨自例外的。但我自信總比一部分人好些，爲什麼呢？現今一般學者，知道的要明說，不知道的也要瞎說，結果弄到連他自己也莫明其所著書的怎麼樣；至於讀其書者，那就更可不可

用多說了，而我今對於這部「中國學術大綱」呢，那就大大不然了：非常自由，並不勉強，如自己所長的那一部分，便無妨的詳細一點；平素不大研究的那一部分，便無妨的簡略一點；知道便說，知道不知道，便說不知道，萬不敢強不知以爲知，好像惠施的對黃繚那樣：「不辭而應，不慮而對，說而不休，多而無已，又以爲寡，益之以怪。」莊子天下

篇孔子說得好：「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語論

而漢書藝文志也論得非常痛快，

他說：「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異之義，

孔子曰多聞闕疑

而務碎義逃難，便

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這就是我隨心得的多寡，定編著的詳略之大概情形。

(二)材料問題(1)材料的創因 怎樣叫做材料的創因？創是指出自自己心

得的，因是指來自他人著作的。現在一般學生常常你抄來，我抄去，抄到全班雷同；尙有把別人家的成文，完完全全抄出，不過再換一個自己的名，儼然真像自己作的，這

是作文的大不道德。但何可專怪學生？就是在教員中，也有東抄西摘他人的成書，編爲自己的講義，以去瞞騙一般學生的。但如止於講義用的，還不大要緊；甚且有人敢把抄便的稿子拿去出版，公之於世，這真是大不要臉了！我前在北京書肆裏面，便看見上海附近有一個大學教授著的中國哲學史三卷，就是這麼一回事，而他連聲明一聲是由參考某幾本書來的也沒有，這真是荒謬絕倫了！至於某教授所編墨子學案一書，其中有一部分是抄現成的，而竟也由講義拿去出版，但他有言及其出處，實在算不了什麼大違背。可是竟有一般頭腦較簡單者，猶一意大聲去痛罵那般抄襲的人；甚至連由參考而來的著作，也不少見優容。而我對之，却以爲要分別觀之。至於怎樣分別，我最近已經說過了：如說一無所根據而能大有可觀的，那自古及今就很少看見；且有時反給人家罵一聲「妄自臆說，無稽之談。」惟有關於自己的思想方面，比較的不在此限。我們試想想看吧：如司馬遷的史記，同班固的漢書，不是中國的兩部領袖史書麼？然而史記在漢以前的一部分，大半是選擇國語國策世本等書而

成的；漢書在漢武以前的一部分，完全是移錄史記的原文的；史記的屈原列傳是採自劉安的，漢書的藝文志就是劉歆的七略。馬班尚不足道；我們再去看看所謂中國維一的大聖人吧：這就是人人都知道的孔子呀！他不是自己說過「述而不作」的話麼？我還要更明白的加他一句「刪而非述」的話。如易傳多是「述而不作」的（？）如尚書詩經全是「刪而非述」的；就是那部春秋也是根據魯史而成功的，據孟子說雖然不是「述」，但也不算「作」。以孔子的博學，尚且如此；至於其他，那就更不足怪了！我今有見於此，所以主張分別去批評他。俗人不也是有句話說麼：「偷拿是賊，明借是友。」那般雜抄他書而不聲明的，就是偷拿的賊，如自言其所根據或參考處的，就是明借的友了。友與賊，那可混爲一談呢？

我在上兩節裏，已經自認不能博而又精了，結果只好隨心得之多寡，定編著的詳略，這就是說心得多便多說一點，心得少便少說一點；如沒有多大心得的，就想去參考他人的成書，如又沒有成書可參考呢，那就一點也不說了。簡而言之：就是「創」

的也有，「因」的也有，「創」因皆有的也有，「創」因皆無的也有。在本書中，大概如此。

(2) 經過的久暫 不但在大學中對於「國學大綱」或概論一學程，時期很短，鐘點很少；就是我本身來這大夏大學教授也不過一年，編這部「國學大綱」的時間，嚴格算起來——除了因事與病輟編外——也只有半年。時間太短就無法弄出好書來，好書就多需要長時間。試以史言：則二十四史之最佳者莫如史漢，史記經談遷父子二人而後完成，漢書經彪固昭父兄妹三人而後事畢，這是時久而書美的；而二十四史中之不善者莫如宋史，亦人所知，其書二百餘卷，費時不到一年，這是時暫而書劣的。再以文而論吧：司馬相如作文極遲而極優美，若枚皐之作文則極速而極平常。今吾之才既不如古人之美，而本書之成又欲速於昔人所著，一念及此，怎樣好去動筆呢？還不止此，就是我所有的書籍也皆分寄四方，有的在德化本家，有的在廈門旅館，有的尙寄在南京，有的尙留在北平；至於隨身帶來的，區區一箱而已，況學校裏

的圖書又不多？就是這個上海雖然大小書局林立，但也很少材料總供給的大機關。回想北平雖然不是出書的地方，但却很多大圖書館和類集書肆，不論新舊書籍：舊至古本善本，新至今版外版，應有盡有，俗人有句話說：「所出不如所聚。」真是再對沒有的。我一時既得不到什麼好參考書，就是要大舉也有所未能好了！我這部至低限度的「中國學術大綱」一方面便於讀者，一方面便於編者，既兩相便，也就算了！

(三)方法問題(1)體裁的簡明 這個關於「編著」方面的要「簡」而又「明」的問題，恰與剛才上頭所討論關於「學問」方面的要「博」而又「精」的那個問題，同是一件最爲難的事體。我在這裏，也可引一個例子來談談。桓譚新論說：「秦近君能說堯典編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日若稽古』三萬言。」如尙書的只說「堯典」與「日若稽古」，便是簡而不明；若秦近君用十餘萬言去解釋他，便是明而不簡。又如漢書藝文志說：「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簡而不明，甚至如「五字之文」明而不簡，甚至如「至於二三萬言」再舉一個較顯明的例子：如大家對於

「國學」一途要極簡嗎？「經史子集」那四個字，便是再簡沒有的了；然大家又一定要嫌其太簡。如大家要明呢？那部「四庫全書」，通通把牠研究一過，也就是再明沒有的了；然而大家又要嫌其太明。明的嫌他太明，簡的嫌他太簡，又要明，又要簡，果是一件可能的事嗎？這個編書的人，真是爲難得很了！但是我想比之上頭那個精博問題，還比較的可能辦到；其實何必如秦近君等那樣的嚕嚒？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裏也說：「易經這一部書，古今來多少學者，做了幾屋子的書，也還講不明白……我講易，以爲一部易經只有三個基本觀念……」這並不是後人的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的頭腦不如今人的清楚；而古人的方法也遠不如後人的講究。如現在的人，多不像古人那樣迷信，古代也沒有現在西洋的科學方法。所以一般古人，雖然解釋到十餘萬言，或做了幾屋子的書，但其主腦系統，我們還是看不出；並且連他的鬼影，我們究竟也捉不着。關於方法的要求怎麼樣，讓我另行去討論。現在可以插說一點的，就是本書的文體，本來爲簡省起見，是打算用文言的。至吳稚暉先生獨以爲白話的字

數，不見得就比文言多。似乎有點「強辭奪正理」吧！可惜當我上學期講授到孔子哲學的時候，便有一位同學對我說：「蔡先生！你的文好像莊子一樣，而抄講義的人，又省去標點；我們有好多地方連句讀在那裏也找不着，真是要讀也讀不得，怎樣辦呢？」我的耳朵聽到那話，便很不忍而且決心的對他說道：「以後不論編什麼講義，都要用起語體文來了。」這就是本書所以不用文言的唯一原因。但現在既然用白話，而字數自然就不能像文言那樣簡省了！這是我將字數簡省一點，而終於簡省不得的。請就此告一段落，等我講到程度問題的時候，再來爲本節補充一下吧。

(2) 方法的新舊 中國人著書，向來就不講究形式的方法，所以結果弄到一場糊塗，沒有系統。就是起一個書名或題目，也起得非常飯桶，常常和篇中或全書所說的完全沒有關係，或者是相反的，甚至有連隨便的名目都想不出來，如做一篇文子類書中爲多或一首詩，往往把篇首的兩字拿出來做代表，真是笨伯極了。除一般記事編年的史書外，大半都是雜亂無章的；或無頭無尾，或有頭無尾，或有尾無頭，或頭尾

顛倒……一直到了現在一般新人物，才去依傍西洋人的編書法，至少也有上下和首尾；但其中的分敘別述，還很沒有秩序和聯絡。作者對這一點，向來就很注意；不過一直到現在，還想不出什麼具體辦法來。但我自信，無論如何，總比較那般看不到的好些！我以為於西法外，如能再去學一點古書的長處，那就不難盡善盡美了！古書有什麼長處呢？古人做大部書，雖大部分不好；至於做小篇文，却大多數是好的。大部書中如易經，太玄更好，便是一部極齊整的古書；小篇文如劉歆的七略，也還是可以的；更如後世的八股文，以形式論，也就夠得上「好」之一字了。我們編一部大書，如能做到如古人的。一篇小文，以我們大書中的各篇，比古人小篇文中的各段，使其對於「上下有序，」聯絡一氣，二點完全一樣；其不能無一點差的，也止於彼為我之縮小，我為彼之放大而已。這就是取西書的系統，兼古文的一貫的好處了。作者在前此的編著中，如孔子哲學之真面目，老墨哲學之人生觀，三大思想之比觀，那幾部書，其內容有無價值，可以暫且不問；而其編述之形式方法，也許很有可取的地方。

著先秦政治思想史裏說：研究法有三種：第一問題的研究法，第二時代的研究法，第三宗派的研究法。按這如以歷史的體例來比喻：則問題的研究法有如史中的紀事體，時代的研究法有如史中的編年體，宗派的研究法有如史中的列傳體。吾今不是編學術史，自然用不着以人爲主的列傳，與以時爲主的編年二體。但如書中的哲學一部，以道儒墨法，依其時之先後而排，就有點像編年；關於述各學之起源及其變遷處就是純正的編年式其就老孔墨韓各人而分述，就有點像列傳。至於問題的研究法，那吾更多所借重了！例如分「中國學術」爲字法，文藝，史地，哲理四部；……分「字法學」爲文字，文法二學；……分「文法學」爲實，虛二字；……分「實字」爲名，代名，動靜，形容五詞；……這就是下面的系統的。尚有一個上面的系統，就是以部首中後三部統篇，上篇下篇以篇統章，以章統節，以節統段……把這上下兩面的系統合成一個，就好像天干與地支的相配了！不過現在因本書範圍廣大，種類紛繁，不能現出什麼特色的地方來罷了！惟就大體或其小段而觀之，還是很有次序——有頭有尾，聯絡一氣。